

文庫博物館專集（五十九）

【编者按：黄帅、李庆霖以及马振扶事件里的张玉勤及其老师都是七十年代初被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小人物”，一时家喻户晓。本刊这一期连载的“李一哲大字报”对他们也有提及。以下三篇文章可作为了解这些人物和有关事件的参考资料。】

今日黄帅后悔了

· 佚名 ·

一日上午，笔者在纵横交错的北京大小胡同瞎转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并在五楼那间情报资料室的门前站定，敲响了淡绿色的门。

开门的正是黄帅，她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一副大大的全塑框近视眼镜，一件淡色的短风衣，一双旅游鞋。

她的头发没有烫理，只是经过自己稍稍修整，显得自然素雅。几绺刘海弯弯地遮住了前额，她的眼睛在睫毛下忽闪忽闪，显出几分纯真，几分困惑。

笔者从皮包里取出采访本。

“不，随便聊聊吧，别记什么。”黄帅阻止道。

“为什么？”笔者问。

黄帅苦笑了一下：“何苦呢？我并不是所谓的名人。过去的动荡生活已经够了，现在我极需要一种平静。”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认真，从她仍旧不乏天真的脸上，笔者似乎仍旧能看出当年她“成名”时候的幼稚模样。

“听说你拒绝过几家报纸记者的专门采访，有过这回事吗？”

“是的，其实，我真的还是个孩子，想随随便便地说所有想说的话，随随便便干爱干的事。如果你仅仅是‘个人的你’，倒也罢了，但我一想到你是搞新闻的，有一天你会把你我之间的谈话公开给整个社会，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黄帅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女孩子，在经历了一场对于男的说都难以忍受的痛苦后，如果在她已经平静的今天，再让人们在大街小巷津津乐道地谈论，进而也搅乱别人的平静，这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

一九七二年，年仅十一岁的黄帅，卷入到一场可怕的政治漩涡中。对当时的情形，她这样回忆道——

“我确实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一次，我在课堂上偷偷地看小说《艳阳天》，我被小说迷住了，以致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我都没有察觉。老师在我旁边站了片刻，见我还是低着头看小说，并不时‘吃吃’地笑出声来，以为我是有意不尊重老师（天哪，我当时真不知道老师就站在一旁呀，要知道我准会吓得跳起来了）。于是，老师恼怒了……”

她说——

后来，我越想越委屈，一冲动，便给当时至高无上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来信。

信寄出后，我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我照旧上课、下课、回家、玩橡皮筋。可是，半个月后，报社居然煞有介事地来了两位记者，把我找到一间办公室……

以后，在这年春季的某天，《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所谓的《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和评论员的文章。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上了报纸，成了全中国著名的‘反潮流的英雄’……”

“可以后呢？也就是你渐渐懂事以后？”笔者这样问黄帅。
黄帅思索了片刻，又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是的，打那以后，我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报纸、电台经常出现我的名字，电视屏幕上也有过我身穿军便装出席招待会的镜头。我们那位语文老师后来受了批判，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我的几位老同学知道，我曾悄悄地要她们捎口信给老师，说我对不起他。真的，现在我更感到对不起他。不知他还在不在附小教书了，我一直想去看他。

讲此番话时，黄帅不时摘下眼镜，用素花手帕擦去泪花。我想，这泪水是真诚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天，黄帅正在人民大学附中校园散步，突然，一位女同学十分神秘地告诉她：“黄帅，中央又出坏人啦！”“真的？抓起来了吗？”黄帅吃惊地问。“当然！”

几天后，中共中央郑重宣布：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四人帮”！黄帅和人们一样高兴。

深夜了，当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接近尾声时，黄帅和同学们说说笑地往回走，大家行至一个僻静的地方，突然跳出几个小青年。“看呐，江青的小爬虫来啦！”“还装模作样高兴呢，吊孝去吧！”还没等黄帅反应过来，一大把沙子就劈头盖脑地向她脸上打来。“啊——”同学们吓跑了，只剩下黄帅一个人。

她惊恐地蹲下来，等待着第二、第三下……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很强烈的孤独感。“你是江青的孙女吗？”那时候，曾有人问她。（这种无稽之谈，令她啼笑皆非。）“你每星期向江青汇报几次？”又有人问。（“江青？我和她有什么联系？”）

那个时候，黄帅多少次想到过死，然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乾淨。她的十六岁生日那天晚上，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在她家里。大家默默地坐着，十六支红色的蜡烛插在生日蛋糕上，她没有勇气吹灭它们。以后的路怎么走？她开始反省、思考。

一九七九年九月，黄帅被录取到北京工业大学七系（即电算系）。“你就是黄帅？”第一次报到注册时，教务处一位戴老花镜的中年人仔仔细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露出慈爱的笑容，“欢迎你，小同学！”

黄帅感激地点了点头，用牙咬住嘴唇，不让泪水流出来。

很多高年级的同学友善地涌过来，帮她提上简单的行李，送她进入女生大楼。同寝室的女同学争着要将好铺让给她，结果最后大家只能以抽签解决。面对这一切，黄帅心中充满了内疚之情。她想起那份《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曾给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多么大的破坏性冲击，曾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多么大的混乱……黄帅开始懂得了理解，懂得了被理解。

黄帅的一位大学同学这样回忆道：“她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是最好，但大家都敬佩她的精神。我和她同寝室近三年，我很少见她晚自习在十点半以前回来。当然，后来谈起恋爱来，那就另当别论了。”

“按规定，大学期间似乎是不准谈恋爱的。”笔者说。

黄帅笑了笑：“按规定是不行的，可同学们可以想出招儿来，比如友谊、互相帮助啦。”

一九八二年八月，黄帅在大学生夏令营里认识了刚刚毕业留校的他。

她的他是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但谈吐幽默，处世办事果敢又恰到好处。不久，他们便热恋起来。

黄帅讲了下面的事。一天傍晚，她照例提着保温瓶去打水，行至半路，她发现有两位一年级的学生悄悄地尾随着。她故意放慢了脚步等她们走近时，问道：“你们干什么呀？”

“看看你呀！”

“黄帅姐，你原来没有逝世啊！”她们说完，没有恶意地嘻嘻一笑。

又一天，黄帅去某图书馆借书，那位女工作人员无意中看到了她的名字，于是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叫喊开来。“好耀眼的校徽哪，反潮流的英雄不当啦？”一个男青年起哄道。“人家是政治臭了技术香……”有人附和。面对这些，她没有反驳什么，她心里感到坦然。因为，她知道人们唾弃的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时代和那个时代造就的黄帅；而她，今日的黄帅，在安定团结的大好环境中，正和亿万重新觉悟起来的中国人一道，开拓新的生活。

现在黄帅生活得很好。她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白天的她在研究所上班，晚上还在中国科学技术院的一个“孩子外语班”任一个小时的义务老师。面对充实的生活，她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黄帅，她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用自己的行动写一本新的“小学生日记”。她怕别人用她的过去来看她，她一直在致力于创造自己的现在和将来。

□ 原载《美洲文汇》第84期

∞ ∞ ∞ ∞ ∞ ∞ ∞ ∞ ∞ ∞

李庆霖：何补无米之炊？

• 派 克 •

25年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李庆霖，用朴实的语言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在后来曾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信——“我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系列阴暗面和“知青”们所遭受的苦难。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读到了这封信，流出了悲凉的泪水。他就给李庆霖亲笔回信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全国，“知青”们的困苦开始得到正视和解决。李庆霖成为了“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官至国务院知青办成员。1

1977年11月14日，李庆霖在福州被捕；1979年6月李庆霖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定为“现行反革命”而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关进福建武夷山下的一座监狱；1994年4月获准减刑出狱。

◇ 一身病患 家境贫寒

剥落破旧的木门打开了，现年70岁的李庆霖双鬓斑白，目光游移，对作者的造访甚感突然。他以低缓的语调说：“我回来后，很少与人来往，历朝历代都有一句话，叫‘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我现在如此‘塌鼻’（莆田方言，意为衰落）——作者按）不敢指望亲戚朋友来探访。”李庆霖讲话时喘着气，需略加停顿歇息。历经近20年的身心困挫，他已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天气一热，就会发作。

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原为莆田四中的炊事员，因受牵连而被开除公职，一直病休在家，已于前年病故。李的大儿子李良模及媳妇在福建仙游糖厂当工人，因企业效益差，每月工资仅120元。二儿子李良贤原在莆田黄龙林场做工，最近调到莆田四中当图书管理员，工资也仅200多元；女儿在福建省体队工作，月工资300多元；女婿在国营糖店工作，“也快垮台了！”李庆霖说。因家道贫寒，李家的日常食品为大米、青菜、豆腐。

◇ 怀念领袖 信奉基督

李庆霖的住宅是三间陈旧的平房，除了一把吊扇还算光鲜之外，家具极简陋破旧，挂在正厅墙壁上的一面镶着毛主席头像的镜框份外引人注目。李虔诚地说：“土改时我就开始挂毛主席镜框像，之后，一有新版的主席标准像，就买回来添加上去，现在挂的是最新也是最后版本的主席像。”我猜想，那个已显厚重的镜框里，起码镶进了数十幅不同版本的毛泽东头像。

李感情复杂地回忆起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细节——

“当时我考虑主席已80岁高龄，信上的字写不清楚不好，所以，用300格一页的信纸，用钢笔一格写一字，标点也占一格，他老人家一看就清楚。”

“我是经过调查才写信的，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信里都是讲实话，对领袖是不能骗的，对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骗的。”

“信是按正常平信寄，有谣言说这信由我女儿到北京参加运动会时转给主席。这不真实，她小小一个运动员怎么转？”

“主席的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家里，没有批转给基层组织，省、地、县委一概不知道此事，写信时没想得到回信，收到主席的回信后像做梦。主席用毛笔回信，简单几句话，横写，繁体字，目前已下落不明。主席寄的300元钱就当作历史文物了，一直没有花。”（此款曾一直以“李庆霖”的名字存在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县支行。后来怕被人抄走，才把它和另一笔存款混在一起。——作者注）

李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让人觉得他在夸耀自己曾有过的辉煌。因为他的升迁及红极一时，更多地带有身不由己地在时代潮流中漂浮的色彩。对他来说，20多年前的事的确像一场梦，他引为憾事的可能是这一生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他之怀念领袖，乃出于精神上的向往，所以，当我知道李和妻子都信奉基督教时，并不感到惊奇。

李宅的过道上贴着一张基督教会印赠给教友的年历，厅里悬挂毛主席头像的镜框下，就有一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图。李说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做礼拜。

◇ 牢狱之灾 平安渡过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认为是“四人帮”在福建的亲信而遭逮捕。另有一条罪名是“诬蔑中央和省、地委领导”。

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说：“我爸‘小教鞭’，指责基层干部走后门优先把当‘知青’的子女招工招生招干，本地政府某些人就因此趁机整他。”据了解，早在李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情在社会上传开后，当地政府就曾组织人对李进行反调查，欲驳斥李的言论，直至毛给李的回信公开后才平息。而在1976年以后，李沦为阶下囚。

1980年，李被转入位于武夷山下崇安县的一所监狱，继续接受长达3年的审查。1983年起，有关部门准许李的家人前往探望。

与一些不学无术、鲁莽粗俗的“文革”中的其他政治红人相比，早年毕业于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的李庆霖显得极具涵养，言谈举止也颇合文人风范。正因如此，李在狱中受到了管教人员的某些优待。

李在狱中被安排负责给没文化的犯人上课；管理狱中的报纸、图书、电视机；每天早上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各地新闻联播”；后来还负责编辑监狱内一种给犯人看的铅印报纸。

李说，“监规狱律很严格，围墙也很高，但来武夷山旅游的许多上海知青得知我被关在这里，还是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看我……”

他还感叹道：“明史上海瑞骂皇帝被关17年，我按照圣旨精神倒关了19年，圣旨就是中共中央文件。”

◇ 继续上访 继续写信

李庆霖在1994年出狱时，他的儿子接他回家，因为他已认不得归家的路。

出狱后，李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知青”朋友的信，除一般的问候之外，有人在信中说准备办一个酒家，取名“李庆霖酒家”，希望得到李的同意，并说愿给1万元。李谢绝了，并说“我不能靠名字吃饭”。

虽然名字不能用来吃饭，但李还是希望能为自己正名。据莆田县信访局的同志说，李出狱后不久，即在1995年给江泽民和李鹏同志去过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李的信转回莆田县信访局，但没有得到任何批复。

李在信中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生活困难，希望能给出路；二是给家属恢复工作；三是给自己平反；理由是“我一直跟党走中央走，对毛主席有感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粉碎‘四人帮’以后地方借口整我……”

后来，李又给莆田市市长去信，希望能解决家里的实际生活困难。县信访局把李的这一请求登在了“要信摘报”上，县领导看到后，让县民政局每月特批给李210元救济金。但救济是救急不救穷，据说这笔救济金随时都有被取消的可能。

◇ 往事如烟 今生何堪

李庆霖每天下午如上班一般，总要到离家不远的县信访局翻阅报纸，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现在的信访局办公室就是当年拘留过李庆霖的地方。每天傍晚，李到附近的街道散步，路人就悄悄相互指点道：“这个就是李庆霖。”晚上则看点书，听听莆仙戏。

1995年某日，莆田市邮政局门口的阅报栏上贴出一张对联式的大字报，联句为“上正中歪下乱来，民穷商富官发财”，社会上流传说是李庆霖所为，李对我说：“我不管社会上的事情干什么，那是故意栽到我头上的。”

当我问李是否想对2000万“知青”说点什么时，他抬起头，沉思良久，一字一句道：“他们对酸甜苦辣都经历了，今天，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成为社会中坚分子，我感到高兴！”但他注意到手里拿的那本红色封皮的“救济证”时，又不禁长叹一声，“我已成了这个社会上最没用的人。”这一声叹息令人不知何从劝慰。

步出李宅回头望去，70岁的李庆霖还沉缓地挥着手，向我道别，他头顶门梁上，年前贴上的春联，字迹依然清晰，那是由他自己书写的楷书，方方正正的“霞映满天”四个字。

∞ ∞ ∞ ∞ ∞ ∞ ∞ ∞ ∞ ∞

你还记得马振扶事件？

• 深 风 •

◇ 学生跳湖轻生，教师被捕入狱

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拨转到二十四年前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下午，刚刚恢复考试制度不久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女学生张玉勤在填空题上填了几个词组后，就发现再也没有她会做的试题。面对陌生的考题，她在卷子上写写抹抹了一会儿后，便把卷子翻过来，在背面上写下了这样几句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能当接班人。”

张玉勤写后，自觉无趣，便把卷子揉成一个疙瘩塞进衣袋里，监考老师发现了张的举动后，责令其交出了这张答卷。第二天下午，得知了此事的班主任老师杨天成便对张玉勤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张玉勤低着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为了教育其本人和学生，杨天成让张玉勤在班里做了检查，但姑娘害羞，趴在桌子上哭泣不止，杨天成一怒之下，公布了张玉勤的顺口溜，此时，张哭得更厉害了。杨天成严肃地说：“你要向同学们做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天晚上，杨天成向校长罗长奇汇报了张玉勤在考卷上写顺口溜的事。

次日早上，校长罗长奇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反复强调了学习纪律和国家恢复考试制度的意义，不点名地批评了张玉勤。此时，细心的杨天成却发现学生队列中不见了张玉勤，他怕她想不开出事，就派了几个学生寻找。张玉勤被找了回来。杨天成安慰她不要背思想包袱，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好好学习，争取下门功课考好，张玉勤诚恳地点了点头。

这天上午，张玉勤没有继续参加期末考试，而是让同学给老师带了个话说她有病请假回家了。张的骤然离校令杨天成不安，他急忙来到了七、八里外的会岗村。汗水淋漓、一脸惊慌的杨老师亲自到家寻访，张玉勤父母十分感动，他们说：不用找了，这孩子过两天会回来的。然而，学校不能撒手不管，他们还是派出了几百名学生四处寻找，但均无结果。那么，她到底去了哪里？

学校师生和张家的亲戚朋友像拉网似地找遍了马振扶的沟沟坎坎，但仍未见到张玉勤的踪影。

十四日这天，寻找的人们在距离马振扶五、六里的虎山水库的水面上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人们七手八脚将死尸捞上来一看，果真是张玉勤。为了让家里人知道她的行踪，她还特意将布鞋放在桥边上。张玉勤的死因经公安部门验尸和侦查后得出了自杀的结论。经协商，学校拿出一百元，买了棺木，与张家联合处理了丧事，埋葬了张玉勤。

为此，杨天成痛苦不堪、悔恨万分，他和罗长奇多次带着礼物看望张的父母。他哭泣着对其父母说：“玉勤死了，我就给您当儿子，我改名叫张继勤，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为你们养老送终。”张的父母说：“杨老师啊，可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啊！”此事经地、县调查组多次调查，认为罗、杨有错，但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应批评教育，但不负刑事责任。

一九七三年十月，河南省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平息已久的张玉勤自杀事件又重提了出来，大会还以简报的形式将此事件材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并抄报国家有关部门。

两个月后，“四人帮”派人来到了马振扶对张玉勤之死作了所谓的调查了解。一九七四年农历正月十一这天晚上，马振扶礼堂内组织了批斗罗长奇、杨天成的大会。批斗会结束后，罗、杨被五花大绑捆着押往唐河监狱。几天后，一次声势浩大的批斗罗、杨大会又在马振扶举行。那段日月，批斗罗、杨的会议接踵而来，大小批斗会不计其数。随着批斗会的步步升级，挂在罗、杨脖子上的牌子，也由最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升级为“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犯”。三易其牌，性质变了三个档次。此间的罗、杨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罗长奇的牙齿全部脱落还患了肺结核，本来魁梧的身体瘦得形销骨立。杨天成满身浮肿，用手指按一下皮肤，就是一个深深的凹坑。

◇ 孤灯冷月男儿泪，人在狱中心在外

铁门铁窗，孤灯冷月，漫漫的时光里，被圈在牢里的罗长奇和杨天成十分想念妻子儿女。然而，乡音杳杳，家书不通。夜深人静，杨天成的脑海里不时地翻滚起回忆的浪花。书中不是有过坐监的人用面包藏书、牛奶写信吗！想着想着，一个给妻子写信的办法终于有了。

第二天一大早，杨天成就起了床，他从竹笆床上用指甲劈出根竹篾，在水泥上磨尖后，缠上一些被套棉絮，将竹尖用唾沫润湿后藏在袖子里，放风时，偷偷地在院内的黑体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上磨擦，然后写在烟盒纸的背面。就这样，一封用“竹笔”写给妻子，“你好好在家带孩子，安心生产，不要挂念我，让孩子上学，我在这里很好”的短信，整整写了半个多月。信写好后，他撕开被角将信藏在棉絮中，托人捎回家浆洗。细心的杨天成怕妻子发现不了，特意从席上掐了一节竹篾，在水泥地上磨成竹针别在那里作记号。过了中秋节，妻子找人送来了被子，杨天成急忙打开被角寻找回音，然而，竹针不见了，信却还在里面，已被洗成一团纸浆。杨天成一阵失望之后，又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写一封同样内容的信。这一次，他又想了一个方法，他把信塞进被角里，从被子上揪下一些线头待同牢的人都睡熟后他爬起来搓啊搓，搓成一条长长的细线，一头系住信，一头留在外面。他想：这次玉芝拆被子时看线头，一定能发现此信的。没有文化的妻子一定能请人写信用同样的办法，送被子时捎给他的。一周后，拆洗好的被子又捎回来了，天成翻开被

角一看，一根细细的线头露在外面，他的心里异常的激动和高兴。

晚上，借着狭小的窗户中射进来的阳光，他把手伸进被子，摸出那个小纸卷一看，却是自己写的，天成难过极了。妻子一个人抚养着五个幼小的孩子，生活的重担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而此时的她却得不到丈夫的只言片语，默默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一切。如今她的身体好吗？老胃病还常犯吗？儿子树峰、树巍还在上学吗？树明也快上学了吧？

杨天成站在窗前遥望着远方的家乡泪如雨下。他没有放弃与妻子联系的念头，这次他把棉衣的领口拆开，在领子深处放上两枚硬币，又在拆口处穿上一根长线。他这样做，一是希望妻子拆洗衣服时能够发现线头找到硬币，然后找人写信用同样的办法，信件放进衣领捎回狱中。他思念妻子，渴望夫妻团聚，几天后，拆洗的衣服捎回来了。杨天成小心翼翼地打开衣领，留在外面的线头不见了，那两枚硬币却依旧藏在衣领中，得不到家人声音的杨天成捶胸顿地，玉芝啊，玉芝你怎么这么笨啊……。

事后，天成才得知，他找人捎回的衣被，妻子见物思人痛苦万分。憨厚老实的她根本没想到天成会给她这个一字不识的女子写信传书。她也有过请人写信捎给天成的念头，但她思来想去还是不敢写，这样会加重天成的罪行。

与杨天成夫妻相比，罗长奇夫妻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智与勇敢。罗长奇被捕，妻子李书坤仍旧在校教书，马振扶距县城六十多里，为了节省那七、八角钱的汽车费，她宁愿徒步往返一百二十多里看望丈夫。李书坤虽月月都去探监。但除了送衣、送物外不准与丈夫会面。此间，谣言四起，说罗长奇患肺结核做手术后死于狱中，说李书坤撇下幼小的孩子已跳河自尽。

闻听此讯，牢中的罗长奇悲不自禁，思绪万千。他想，如果妻子还活着，他就一定要让妻儿卸掉“反革命家属”的包袱，不能让妻子跟着自己受牵连。于是，他从床笆上劈了一根竹篾，放风时捡一小块碎玻璃将竹篾削得细尖，然后在砖墙上磨出一支小竹针，再从被子里抽出一根线，往特意撕下的上衣兜布上绣字。竹针没有穿线孔，他就先在布上穿小孔，然后用手指将线搓细，穿在布孔中。就这样，罗长奇用笨拙的双手竟绣了“为了你和孩子，请改嫁”几个字。然后将这块绣有书信的兜布卷成一个小圆卷，塞入被子角内。当李书坤为丈夫拆洗被子时发现了这封用针线写的书信时，她的心碎了。夜阑人静，儿女们已进入梦乡，李书坤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流着眼泪穿针引线，她在白布上绣上“多保重，活下去，我等你”的“绣书”后，用同样的办法将这封饱含深情厚意的短信藏在被子角里送往县城。

看着妻子的信，罗长奇泪水模糊了双眼。妻子的短短数语，使苦难中的他增强了不少信心。这次他没有偷偷摸摸地绣书信，而是在一块布头上面绣上书包、铅笔、锄头、兔子、房屋和各种符号，意思是告诉妻子，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他还在想着盖房问题，他要妻子种好地，养好兔，好好过日子。

就这样，罗长奇与妻子以绣代笔，相互通信互相勉励，李书坤还用避孕套装上特意做熟的瘦肉，像香肠一样，夹在被絮中使患病的罗长奇吃到监狱中从未吃过的肉食。

◇ 历经磨难终不悔，父子同台育英才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在唐河县大河顿公社栗子园林场接受劳动改造的罗长奇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中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的消息，“四人帮”曾经“利用一个学生事件来迫害教师”。罗长奇的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此后没几天

，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找罗、杨谈话。“罗长奇、杨天成同志，你们的问题纯属冤假错案，应当予以纠正。根据省委通知，给你们平反昭雪”。寥寥数语，罗长奇、杨天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时年九月，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四人帮”为了加罪于周恩来总理，利用“马振扶”事件迫害教师，罗、杨听了之后才明白，他俩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牺牲品。

十一月二十日，河南省在唐河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罗、杨彻底平反后，县里安排他俩留在县城工作。然而罗长奇和杨天成仍然魂牵梦绕着那个偏僻的马振扶。当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患上了疾病还未康复的罗长奇、杨天成回到那阔别三年多的学校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现状是，已改为高中后的马振扶中学教师奇缺，管理混乱，人心思走。罗长奇四处奔波，招贤纳士，身兼校长和授课教师两职的罗长奇没日没夜地干。此间，县里两次调他到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都被他谢绝了，他要为提高马振扶的人口素质做些贡献。罗长奇治教有方，马振扶中学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如今，年已六旬的罗长奇和妻子李书坤不仅夫妻同台执教，还把自己的大儿子罗晓东也拉进了教师队伍。

杨天成重返教学岗位后，学校正缺英语教师。上学时只学过几天A B C的他主动请战。他边教边学，并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以四十岁的大龄参加了河南大学举办的中文自学考试，并在四十七岁那年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同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六年被任命为马振扶中学的副校长。如今，他的四个孩子师范学校毕业后都回到了培养过他们的母校——马振扶中学任教。杨家父子五个同台执教，成了远近闻名的“教育世家”。

□ 原载《美洲文汇》第93期

~~~~~  
【研究报告】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十）

• 宋永毅 • 孙大进 •

### 第十章 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1974年11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1】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

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  
【2】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3】——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4】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5】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6】又如海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揭示：“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7】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当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

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8〕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醒。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久远，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9〕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10〕的方向走去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1977年3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1973年9月13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11〕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1974年10月7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12〕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

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一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13〕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14〕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注解

〔1〕 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4页。

〔2〕 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6月，第59页。

〔3〕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4〕 同注〔3〕。

〔5〕 同注〔3〕。

〔6〕 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第34页。

〔7〕 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第8—9页。

〔8〕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

〔9〕 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1978年，第55页。

〔10〕 同注〔8〕。

〔11〕 同注〔2〕。

〔12〕 同注〔8〕。

〔13〕 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1976年，第241页。

〔14〕 同注〔3〕。

∞ ∞ ∞ ∞ ∞ ∞ ∞ ∞ ∞ ∞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 李一哲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份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份——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

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乾淨。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乾淨，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会、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令、五十次申，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入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

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〇）），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〇）），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

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哪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

？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中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 × × × ×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份，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份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 × × × ×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第十章未完待续）

~~~~~

【读者回响】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人民群众是阻止文革的基础力量

——读《我们有能力阻止下一次文革吗》①有感

• 金 文 •

我是一个国内的学生，由于长期受官方媒体的影响，对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了解得甚少。说实话，在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一向相信科学，反对愚昧的团体及学说。但是我从未有过那样深刻的思考。从未想过这种方式是不合法的，是违背人权准则的。的确，在国内很少能听到或看到关于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论。这也是大陆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取缔法轮功并不是因为它是邪教。而是因为危害了统治者的统治利益。这是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国外的人士把取缔法轮功叫做运动。因为运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活动。而这次行动是纯粹的政府行为，是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活动。所以它并不能被称为运动。

文革是一次运动。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下，特定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特定的人民普遍的思维方式下，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

是谁发起了文革？在一个受到相同文化熏陶的人群中，最容易被煽动起某种情绪。如果说文革是某人发起的话，那么至少他的观点已经被人民广泛接受了。我们回顾历史觉得那是一种错误，但是处在运动中的人们有几人能意识到那是一种错误呢？

单一的经济结构使个人依附于企业，企业依附于政府。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依附于政府而存在。当政府发起某种号召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也没有选

择的余地。这就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凝聚力。“毛主席的指示不会错的”，而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是谁结束了文革？自从林彪叛逃，人们就开始提出疑问，这样忠于毛主席的人竟然是叛徒？我们应该听谁的话。这种迷惘无形中削弱了运动的势头。也增加了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思考。如果说哪个人可以阻止文革的话，那么他一定忽视了群众的力量。

文革后，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对人民思想的控制逐渐削弱。今年中央发起的三讲活动就是例子。“认认真真讲三讲，实实在在走过场，问题都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这是从全国广泛流传下来的打油诗。政府再想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一定的高度几乎是不可能了。

任何运动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政府有权力阻止群众不去做什么事，但是他没有能力强迫群众去做什么事。假使群众没有能力抵制政府行为。他们只要做无声的反抗，即不参与运动，就足够了。

中国的法制是久远的。从韩非开始，中国社会就有了法制。但是法制从未真正实行过。就是因为专制统治的力量，和人们过份依从于道德的心理。很多人认为不道德的东西就应该无条件取缔或镇压。这种思想需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一个长期的思想启蒙才能转变。真正的法制社会，离中国还远！！

□ 寄自 catsweet@hotmail.com

编注：①见本刊 z k 9 9 1 0 a。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吕 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支持：	李健民（澳大利亚）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 CND 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